

第一章

1

一九四九年岁末，山城重庆。

入夜，法国梧桐树和洋槐树的叶子在疾风中凋落，每起一阵寒风，经霜的树叶便猝然脱离树枝，飞鸟一般在空中打旋。沿街店铺关门落锁，有的还另加上粗壮的顶门杠，惟有本钱小的老虎灶敢于冒险营业，昏暗的店堂内坐着一些木讷的茶客，满脸茫然。

电力供应有限，南岸、江北一片漆黑，居民不得不以自备的蜡烛、煤油灯照明。夜空中不时可以听见冷枪声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巡逻队走过街头，在他们整齐的步伐下，大地像是在往下沉。

十九世纪末开埠的重庆港，乃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贸易口岸。南充的蚕丝、江津的柑橘、永川的猪鬃、隆昌的桐油，乃

至云南、贵州的茶叶、烟草，纷纷运到朝天门，或就地批发，或装船东下。数十年间，各商帮的字号和宅院鳞次栉比，两江之中帆樯林立，舳舻相接，密匝匝围住了整个山城。

经过抗战时期的畸形发展，被明定为国民党政府陪都的重庆城，已成为大西南的工商重镇，英国的毛呢、花纱，日本的五金器材、味精，美国的颜料、油灯，印度的香料、首饰，在密如蛛网的交易所内交割。各类汇票、银票、账单、清单，在多如牛毛的钱庄里兑现、结算。江边的旅馆凉爽通风，兼可观景，客商过往自然多愿住此，赴京赴省赶考的学子也多愿在此下榻。客人中还有催款的师爷、逃债的佃户、浪迹江湖的艺人、云游四海的郎中。每至夜幕降临，便有弹琵琶、抱月琴的艺人，敲扬琴、唱小曲的艺妓来店卖艺，为旅客们消愁解闷。

然而，由于国民党军撤退前对这座大城市实施过毁灭性的破坏，刚接管政权的共产党一时又无力解决民众迫切的衣食住行问题，人们欢呼的热潮，不知不觉退落为一股消沉的情绪。就在“欢迎解放大军进城”、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”的标语旁，杂七杂八地贴着“今日米已售罄，明天请早”、“本店门面转让，价格面议”的纸条，像是在无声地抗议市面的萧条。

此时此刻，在中共西南局驻地大院内一幢楼房内，有点亮光在走廊上一明一灭，一个人正站在那里吸烟。

这个人正值中年，推一个小平头，嘴唇和下巴的胡须按军

队条例刮得精光。他穿一身部队高级干部配发的黄呢套装，未戴军帽，却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，编号为司政一号。他的眼光敏锐，足以洞穿政敌的伎俩，牙齿细而密，却因长年吸烟而带有烟垢。他讲话的声调不高，但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，极有条理。他习惯大步走路，直达目的地。

他的名字叫邓小平，几天前，他和刘伯承一道，率领第二野战军指挥机关进驻刚解放的重庆。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当时习惯的做法，二野党委实际兼任中共西南局的领导。

生与死的考验已成为过去，那震撼四野的枪炮声，也消失在祥和的天空。多年以来，邓小平终于有了一张安稳的床，再没有十万火急的电报将他惊醒，没有尖利的哨音催促他出发，枕头下不用再放一把防身的手枪，门外不必再设双岗。可是他仍然睡不踏实，经常很早就惊醒过来，蹑手蹑脚到户外去吸烟、散步。

他肩头荷着很重的担子，党中央已任命他为西南局第一书记，大区的一把手，凡事都要对中央负责。在他的写字台上，搁着两部黑色的电话机，下级党委决定不了的事就会随时向他请示。在他的文件夹里，每天总有待批阅的急件，如果他未能及时签署，部队和地方的工作进程就要打折扣。由于他任第二野战军的政委，他的老部下都习惯称呼他为邓政委。

中央的要求很明确，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拿枪杆子的手要学会运转国家机器。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

站稳脚跟，共产党能否管理好国家，广大人民群众有疑问，国内外的朋友也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。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过，中国的发展方向，是要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。

西南局的工作应当证实，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，有能力把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建设成欣欣向荣的新中国。许多同志已永远留在从黄河东岸直到大别山、大西南的疆场上，以他们的名义，一定要让人民逐步过上憧憬多年的幸福生活。西南局的工作应当证实，共产党人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，还将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。

在他的办公室墙上，悬挂着巨幅中国地图，其中很大一块地方用红铅笔圈着，面积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大，那就是西南局的辖区，包括四川、西康、云南、贵州、西藏五省区和重庆直辖市。多姿多彩的云贵高原、神奇的西藏雪域、富饶的川西坝子、逶迤的长江上游，都是在他的治理范围内。

这里地大物博，物产丰饶，同时，它又是旧社会留下一个大包袱。

大西南远离华东、华北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，全区除重庆因抗战时期沿海工矿企业搬迁来此，使之具有一定工业基础外，成都、贵阳、昆明厂矿极少，有的连牙膏、火柴都不能生产。支撑全区经济的是传统的农业，在某些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，至今还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，即便老天爷帮忙，也仅

能果腹。脆弱的新民主主义种子如何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开花，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。

沿海被国民党军舰封锁，原料器材和零配件进不来，重庆的众多工厂只得暂时停工。一些发电厂、煤矿被国民党炸毁，城市用电都很成问题，供给生产还谈不上。由于经济停滞，重庆的物价好似断线的风筝，一个劲往上升。薪水发不出，全市的学校也在无形中停了课。这些日子，部队的后勤部也像翻过来的口袋，空空如也，军管会和市里的有关部门曾对贫民采取过一些救济措施，怎奈僧多粥少，难以持久，春荒却迫在眉睫。

胡宗南残部盘踞成都，兴风作浪。川西、川北的土匪活动很猖獗，甚至反攻了几座县城。西康省前景未卜，云南、贵州尚未全部插上红旗。

这一仗没有打完，远远没有打完。

西南地区现有六十万人民解放军、九十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和俘虏，外加六十万公教人员、私营企业员工，不包括居民在内，每天天一亮就有上百万人等着吃饭，合起来该是多大的一张嘴！据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告，全市存粮仅可维持三周，一些不法商人则屯积居奇，有米不售。

民以食为天，人民的吃饭问题没有解决，邓小平寝食难安。

在走廊上吸完一支烟，他又把自己关进办公室，用“派克”牌自来水笔在拍纸簿上写写画画。

物价。粮食。开工。生产原料。

没有现成的经验。没有教科书。没人指点。没有路标。一切的一切全靠摸索。

他想起延安的南泥湾，一个旅去开荒，养活了边区几万军民。

不行，行不通。他苦笑着自我否定。重庆是大城市，无荒可开。不过，这里的工厂不少，工业品比农产品值钱得多，一旦开工恢复生产，就能从老区换回食品和油料。

他的头脑中有一些光溜溜的，还抓不牢的东西，但他必须把它们挖掘和整理出来。

像打桥牌一样，他先检点手中的牌，看看有哪些花色品种。

二野部队有六十万人——基本力量。三万地方党员干部、一百六十万工人——依靠力量。西南地区有七千万人民群众——团结力量。

工业，重庆市的门类比较齐全，成都、昆明、贵阳等省会城市也有条件建立新厂矿。农业、牧业，有可能争取自给自足。万事不如粮在手，部队要派出征粮队，深入乡镇，把粮食搞到手，渡过春荒，工厂也就差不多开工了。

突然间，桌上的两部电话骤然响起，急促的铃声此起彼伏。

电话是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陈锡联打来的，即便通话者在远处，他也能感觉到对方焦急的心情：“报告邓政委，本市出现了挤兑，半夜三更的，还有不少白天未能兑换者在银行门前排着长队。巡逻队劝说群众天亮后再来，但先来者不仅不走，还吸

引了更多的市民前来排队。情况反常，非常反常。”

邓小平心一沉。

每天都会冒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，阻止他收拾这个国民党扔下的烂摊子。他现在顶担心的是，这种恐慌如果不能局限在重庆，很可能还会波及到全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，那样一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同样的情况，在上海也发生过，国民党扔下破钞票不负责不说，还要借机掀起金融风波。

龟儿子。

“锡联同志，不要慌，等到天亮摸清情况再作决定。”邓小平对着话筒说，“巡逻队要负责保证群众的安全，公安局要加强警力。”

2

天亮了，挤兑事件浮出水面。

为统一流通币制，重庆市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惟一合法货币，同时公布金银管理暂行办法，明令禁止银元上市，取缔银元买卖。兑换率则仿照解放区现行标准，以国民党时期发行的银元券一万元，兑换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一元，银元本身的兑换率，按当时的贴水率折算。

昨天上午，这种兑换还井然有序，但中午刚过，一个谣言

不胫而走。那谣言说，人民政府此举，是沿用聚敛的老谱，意在搜刮民脂民膏，以充军饷的不足。还有些面目可疑的人，站在街头高价收购银元，散布对人民币的不信任情绪。

下午，又一个谣言掀起了轩然大波：银元券的兑换率说不定哪天就要缩水，如不及时脱手，到头来将会变成一张废纸。

饱经忧患的重庆市民自抗战以来吃够了钞票贬值的苦头，本来对这类事就十分敏感，不少市民以前亲眼见过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惨祸，吓破了胆，以为同样的惨祸即将重演。他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翻箱倒柜，将金元券、银元券乃至不值钱的铜板全部带上，马不停蹄地跑到最近的银行，排成一条长龙。当天未能兑换者，赖在银行前不走，熬更守夜排长队。

这种恐慌的情绪又互相传染，形成恶性循环，好似一场盛行的瘟疫，这种交换的狂热立即蔓延全市。

可怕的挤兑发生了。

今天上午，每个兑换点都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挤满了要换钞票的市民。呼喊声汇成一股震耳欲聋的喧嚣，压倒了汽车的喇叭声、轮渡的汽笛声和人民警察的哨音声。人们气势汹汹，争命似地挤向银行紧闭的铁栅栏。烟雾和灰尘在人群上空团团翻滚，那些淌着汗水的面孔涨得通红，直冒热气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

“换钞票，快换钞票！你们捣的什么鬼？”

“没钞票就拿银元出来！”

“拿银元出来！”

各兑换点的负责干部，缝窗而出，站在长条板凳上，举着个铁皮话筒，一遍又一遍地保证人人都能兑换。但他们越是解释，人们越是不听，更多的人赶来了，虫子似地蠕动着，发出一阵阵蛮横的吼叫：

“少说废话，快拿票子出来换。”

“你他妈的算个老几，换不到票子，老子们今天活活撕碎你！”

“这是孤儿寡母的活命钱，你们不能昧着良心整人呀！”

可以去考验老解放区群众，可以去考验南下的干部，然而刚解放的重庆老百姓是经不起这种考验的。到处都是啼饥叫寒的妇孺，遍地都是冻馁，在这座城市里，要找到生存的理由是那么困难，又是那么必须。

人民币的库存迅速下降。

人民政府的信誉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

告急的电话，一个接一个打到市委来，副书记曹荻秋烦躁地解开风纪扣，背着手在室内踱步。

曹荻秋颇为费解。在他路过的城市里，兑换都未发生问题，比较顺利。那种一戳即穿的谣言，那种经不得核实的小道消息，怎么能把成千上万的市民，能把那些以吃苦耐劳著称的群众，都弄得如此晕头转向，非要在今天把钞票换到手才罢休？

事端骤起，得不到确切的情报，在新区，情况总是这样。

公安局派人作过调查，市民们说，是旁人告诉他们要赶紧脱手银元券的，但究竟是谁首先放出风声来的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。

“情况怎么样，老曹？”陈锡联刚开完军管会议，匆匆赶来问道。

“很不妙。银行来电话，他们的房顶差点就要被掀翻了。我已派公安局的人去维持秩序。”曹荻秋答道。他从玻璃窗中照见自己的脸，使用手把乱蓬蓬的头发抹了一下。

“报告刘、邓首长了吗？”

曹荻秋点点头：“早就打过电话。等不及了，我这就去面见邓政委。”

3

“共产党说了的事就要办，旧钞票一分一文全部兑换。”邓小平走到窗前，眺望着对面的小山包。条石垒就的堡坎上，长出几株黄桷树苗，迎风傲霜，枝繁叶茂。“今天能对付过去吗，老曹？”

曹荻秋盘算了片刻，然后才答道：“我们随军带来的钞票甚多，今天还能凑合。问题是明天、后天，如果持续挤兑，那就难说了。”

桌上的电话铃响了，又是银行的告急，因为群众鼓噪，兑

换速度加快，一家银行的现金即将告罄。

邓小平回到沙发上，把手伸向香烟。

二野后勤部带有人民币，外加一部分金银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些东西用以救急尚可，用以支撑则远远不够。发代金券？新区的群众闻所未闻，难以接受。请贺龙帮忙？他的部队正在围攻成都，军费开支不能动。云南、贵州？人民银行刚开展业务，自顾不暇。惟一的出路，恐怕只有求助于中央，而中央的家底亦薄，共和国初创，税收无几。

无数挤兑者的脸在邓小平的眼前晃动，汇集为模糊不清的一片。

曹荻秋又在说什么话，他完全没听清。他的意识在游移，他想如战争年代那样，下令冲锋，奋力全歼顽敌，痛快淋漓。但是在这里，敌人却藏在暗处，急切中难以全歼。不，不，他说“不”字很艰难，他不善于退却，也不善于求助。日军铁壁合围，扫荡晋察冀，部下请他转移，他不干。国民党军重点围剿，强敌压境，有人建议向其他军区求援，他也不干。做伸手派，绝不是他的作风。哦，若是有一台印钞机万事大吉，但听说那玩意儿是苏联老大哥造的，中国还造不出来。

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闻讯赶来。他身穿皮夹克，鼻梁上戴着一副角质圆框眼镜，显得文质彬彬，双手抄在衣袋里。

“怎么样，小平？我看要惊动中央了。你这个人我知道，有困难自己克服，万事不求人。不过，挤兑风潮不可小觑，否

则你我在重庆立足不稳哩。”

“中央也有困难，想想有无其他办法。”邓小平实在不忍心增加北京的负担。

“西南系新区，财经初创，我说呀，该开口还是得开。”刘伯承说。

邓小平沉思片刻，叫机要秘书进来，口授向北京求助的电文。

曹荻秋这才想起要喝水。

北京高度重视，不到一小时即复电，表示将尽快空运一批人民币来渝。

刘伯承拿起话筒给陈锡联打电话：“是锡联同志吧？我和小平同志研究过了，决定把部队所带的款子暂时拨给你们。中央也答应从邻近地区抢运一批钞票来。记住，不管群众手里有多少银元券，不管他们何时上门，都要照兑不误。”

“要向人民多作宣传工作，”邓小平插话说，“要用积极的行动向人民表明，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。”

“人民币何时运到重庆？”陈锡联在电话里问。

“三天之内。”邓小平回答。

值班参谋出现在门边，手里捧着文件夹。

“进来，先拣要紧的读。”邓小平道。

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、政委苏振华来电：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官王伯勋、第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等人联名通电起义，

贵州全境解放。

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来电：已证实蒋介石飞逃台湾，胡宗南集团乱作一团，成都解放指日可待。

邓小平与刘伯承相视一笑。这些消息冲淡了他适才的心境。

“我还没有打过瘾，老蒋就溜了。”刘伯承乐呵呵地说，“下一步，安心建设新中国。”

“司令员，我有一些思考，正想跟你通通气。”邓小平打开笔记本。

邓小平早就酝酿于心的，是修筑成渝铁路。

素有“天府之国”美称的四川，晚清末年便爆发过与帝国主义争夺成渝铁路修筑权的保路运动，清廷镇压激起民变，使之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。铁路，一个民族强盛之梦，孙中山在他的《建国大纲》中尤为强调，要修四通八达的铁路，尽快赶上欧美国家。但成渝铁路修修停停，数十来始终是一场春梦，四川民众集过资，认购过债券，血也流过泪也流过，见到的只是地图上的一条虚线。

民族的荣光不允许保留这本沉重的旧账。二野入川前，邓小平已指示在华东、华北招收各类专家，组成技术大队，随军南下，为修筑成渝铁路做准备。

“咱们要修铁路，”邓小平说，“以点带面。”

刘伯承眼中放出光来：“小平，你出了一个好点子。这些

天我也老在想，怎样才能把重庆的工厂盘活。除了政治原因，朝代更迭外，还由于四川周围高山屏障，与外界隔绝，消息不灵，经济落后。要想改变这种状况，让四川的建设跟上全国的步伐，必须首先改善交通，畅通物流。至于可行性方面，重庆有煤矿、铁矿，有钢铁厂，咱们把方案搞得扎扎实实，中央会批准的。”

邓小平挥挥手，驱散室内的烟雾，他一思考问题，吸烟就过量。

是的，他手里还有一份曾留学德国、法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名单，那是陈毅的堂兄陈修和提供的。这些专家虽然是旧工程技术人员，却有爱国之心，可以为修铁路出力。这些专家有的在外地，有的在本地，要恭请他们出来为国效力。

“我考虑，是不是这样向中央报告——”邓小平斟酌着措辞说，“以修筑成渝路为先行，带动百业发展，帮助四川恢复经济。”

刘伯承接口道：“在这方面嘛，我也想出一条口号，叫做：‘建设人民的生的新重庆’。”

邓小平想了一下，觉得这个提法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，准确完整，言简意赅。他头脑中那些一些光溜溜的，还抓不牢的东西，经刘伯承一提醒，此刻正变得清晰可辨。

“司令员，下个月要召开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，我建议你到会上去讲一讲，展开讲，多提几条，让各届人

士都明白。”邓小平诚恳地说。

两位老战友议了半天。

百废俱兴不现实，首先要抓重点。这个重点就是要把反内战、争自由的民主堡垒，变为生产的新重庆。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。要组建西南交通部，下决心修筑成渝铁路；要加快城市接管步伐，大型厂矿要优先恢复生产。

两位老战友议定之后，立即形成文件下发，所选调任各部部长、部长的军队干部，限期到重庆报到。

雷厉风行，说到做到的工作作风，使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信用系数提高了，机器的各个齿轮的转速加快了。

4

薄暮时分，有辆黄包车吱吱呀呀地拉过了下半城的望龙门。天空阴霾，彤云密布，雨中的梧桐发出沙沙声，把成串的水珠从光秃秃的树干上抖落下来。临街的铺面，早早放下门板，街上路人稀少，脚步匆匆。

那辆黄包车篷内，倚靠着一位公教人员打扮的先生，穿件半新不旧的棉袍，黑礼帽压在眉际，刚露出一双眼睛。此人将双手抄在袍袖里，好像是在闭目养神，耳朵却在留心捕捉周围的动静。

储奇门，交通枢纽，设有解放军的检查哨。

乘车人赤手空拳，证件又齐备，很快得以放行。

黄包车向前拉去，越拉越远，等到看不见检查站的长木横杆时，车里的那个人才轻轻嘘了一口气。

乘车人叫章隽，他从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没几年，却挂上了中条山少将游击司令的官衔，委任状是蒋介石署名颁发的。重庆解放前夕，他和西南区潜伏组长邹俊明等人奉命潜伏，分头留在本市，待机发动暴乱。

黑暗对章隽是个掩护，他半闭着眼靠在黄色车后座上，回想着半个月来的情况，不禁暗暗得意。是的，这段时间他干得不错，共产党虽然占领了这座城市，却碰上了一连串麻烦事：水运陷于瘫痪，人民币的兑换闹得差点不可收拾，粮价节节上涨，要是远在台北的老头子听到这些消息，不知会乐成什么样子。

章隽的看家本领，就是搜集和刺探本地真实的社会动态，然后由他手下那帮谋士编造合乎情理的谣言。他没有白白在中央军校呆过。

眼看重庆生产停滞，人心不稳，章隽自以为时机已到，蠢蠢欲动。他先后串联基督教应变会、一贯道等反动团体，搜罗国民党军的散兵、游勇，不断干些风高放火，月黑杀人的勾当，扰乱市面。但由于国民党集团远遁，使他在后勤供应、医疗救护方面深感困难，因而到处拉人下水，扩充实力。

在前几天的一次枪战中，章隽的几名党羽被解放军巡逻队

击伤，气息奄奄。今夜，他亲自出马，去找他从前认识的一位大夫入伙。

重庆的下半城，在水运发达时客商云集，正是各种自由职业者摆摊设点的好地方。

半年前，南纪门增设了一家私人诊所，门面虽小，却因收费低廉，服务周到，颇能吸引患者上门。

谁也不清楚这位大夫的底细，他是华西医科大学的高材生，过去在国民党陆军医院工作过，医术高明深得同行的赞赏。但他缺乏那种有力的裙带关系，最终也未能爬到上流社会去，几个月前快快辞职，自己挂牌开业行医。

这天夜里，此大夫收拾过器械，正在灯下独酌，听见有人敲门，他很不情愿，嘴里嘀咕道：“今天冷，我有些感冒，不能外出就诊，实在抱歉。”

“是急诊，”有人在门外哼哼道，“请你特别给我破个例。”

门开了。来人刚跨进屋，便用刚刚听得见的声音说道：“医生，可能你还认识我吧，咱们是老交情了，你在陆军医院替我检查过身体。”

大夫打量了一下来人，紧张得瞠目结舌，由于心慌意乱，他手中的烟头掉到脚上，棉鞋冒起烟来。从前，旧军队里谁没听说过这位绰号叫‘章屠户’的司令？此人双手能使枪，来去无踪，带着一伙亡命之徒，抵得上道地的特工。

“别这么大惊小怪地瞅着我，现在我是你的‘病人’。”章